

关于经济、金融及其关系的一些思考

李似鸿

(江西师范大学 金融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文章通过对古今中外的文献比较研究,发现经济一词,均包含着要讲德性,讲善待他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同的是,西方的经济始于家庭管理,即从微观开始,到近代才发展到宏观,到治理天下,其路径由“齐家”到“治国”;中方的经济始于治理天下,即从宏观开始,到近代才发展到微观,到以人为本,其路径由“治国”到“齐家”。而作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金融,其组成内容货币、信用、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所显现的价值和所受到的境遇也是不同的。最后,就如何处理经济和金融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经济; 货币; 信用; 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 F01; F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5)04-0009-10

一、关于经济

金融产生于经济,也服务于经济。要思考金融,必须先对经济做一下厘清。

(一) 西方的经济

经济一词的最早出现于古希腊人色诺芬所写的《论经济》一书^①,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5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人家里,是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论经济》一书写于公元前387-公元前371年间,是用记录苏格拉底与别人的对话的形式写成的。该书中“经济”的原意其原意为家庭管理,因此所谈论的经济是家庭经济。

色诺芬强调,家庭管理应该成为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研究的是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使财富不断增加。告诫人们在家庭管理中要勤劳、节俭、正直、勇敢、快乐、友善。“饕餮、好色、贪杯、无聊而代价高的野心等,在它们支配着人们的时候,却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人们的身体、精神和财富”。^[1]“勤劳、光明正大、担当责任、节俭的伊斯霍玛霍斯是一个美好、高尚的人”。^[1]“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因为从事农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享乐”。^[1]“你必须让任何得病的仆人得到照顾……,世界上美好的东西的数量所以增加,并不是由于外表漂亮,而要靠日常做好事”。^[1]

从上面的引文中,经济是有德性的,即在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之中,要注重品格与心灵,不可损害他人。同时代的亚里斯多德也认为,家务管理要“重视人事,胜过无生命的东西;重视人的德性,胜过所有物即我们所

^① 阿玛蒂亚·森认为,古印度的《利论》“几乎可以被称为历史上第一部类似‘经济学’的书”。“利论”的“大致意思是‘物质繁荣的教诲’”。参见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11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

收稿日期: 2015-05-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农村金融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研究”(12BJY093);
2015年度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规划项目“苏区振兴中发挥好小微金融作用的
对策研究”;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5年度招标课题“村庄金融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作者简介: 李似鸿(1966-),男,江西修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谓的财富丰足。^[2]事实上,这种认识,一直到古典经济学,乃至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认为,“对财产的维持、增加和利用的持续行为叫经济”。“从思想上的动机来说,经济是以自私心和集体观念为基础的。若只是自私心,则在各个私有经济之间势必引起破坏一切的永恒的斗争;而集体观念则使这种斗争在一个更高的有机体中,即国民经济中得到调和。……因此,国民性、文化阶段等等体现于国民经济之中,国民和国民经济同时成立、成长、繁荣,而再衰落”。^[3]

(二) 中国的经济

中国最早的经济和经济思想,可从孔子(公元前 551 – 公元前 479)、孟子(公元前 372 – 前 289)等人思想中“窥斑见豹”。孔子孟子的经济思想产生的时期,与古希腊大体相当。其经济思想的内容、对后世的影响,足可以与古希腊经济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媲美。孔子之经济思想,散见于《论语》一书中,据说该书是孔子的学生记录孔子的言论而成。关于经济思想,代表性言论有“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见利思义”,“因民利而利之”,“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节用而爱人”,“富民”等。孟子提倡“仁爱”,代表性的言论有“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

在公元 4 世纪初,东晋时代已正式使用“经济”一词。“经济”一词是“经邦”“经国”和“济世”“济民”,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经济”一词在中国充满了丰富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内涵,左宗棠题卧龙岗诸葛草庐中就有“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名句,这里面的经济就是经经济世的意义。

通过百度等网络搜查“经济”一词,可以搜集到如下资料。《晋书·殷浩传》:“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唐袁郊《甘泽谣·陶岷》:“岷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宦游。”宋梅尧臣《汴渠》诗“我实山野人,不识经济宜。”《红楼梦》第三二回“宝玉听了,大觉逆耳,便道‘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里仔细腌臢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与参由明经高第为沁源令,吏治明敏,清节著闻,秩满擢新宁守,才品经济尤为世重。”清孔尚任《桃花扇·修札》:“写的激切婉转,有情有理,叫他不好不依,又不敢不依,足见世兄经济。”清沈涛《交翠轩笔记》卷一:“(施彦士)所著有《海运刍言》,论海运始末利害甚悉,儒生之有真实经济者。”《老残游记》第三回“听说补残先生学问经济都出众的很。”

可见,“经济”所代表的是文人的责任和担当,非常有深度、广度、高度。能做到“经济”二字的人必须文能安邦兴业,武能御侮却敌。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学派的众人,会按照《大学》中“三纲八目”的要求去做学问、做人、“治国平天下”,这个就是古代“经济”一词的最外向的表示。所谓三纲是指“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出《大学》,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在联系。

至于现代“经济”一词实为我国引进日本人翻译的结果。在清朝末期,日本人掀起工业革命浪潮,接受、吸收、宣传西方文化,大量翻译西方书记,将“economics”一词译为“经济”。在新文化运动中,日本所学习过的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故而“经济”一词亦被中国引用。

可见,不论是古今中外,关于“经济”一词,均包含着要讲德性,讲善待他人,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不同的是,西方的经济始于家庭管理,即从微观开始,到近代才发展到宏观,到治理天下,其路径由“齐家”到“治国”;中方的经济始于治理天下,即从宏观开始,到近代才发展到微观,到以人为本,其路径由“治国”到“齐家”。

(三) 由经济到金融

关于经济中的金融思想,亚里斯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人的消费有一定限度,因而这种财富也是有限的,是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

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在这类活动中,高利贷是尤其可恶的,它不是对金钱的自然使用,而是从金钱本身获取利益,在一切生财方式中是最不合乎自然的”。^[4]

二、关于金融

一般来讲,金融包含货币、信用和金融机构三块内容。

(一) 关于货币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一经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5]罗雪尔认为,“简单的直接交换有很大困难。如果存在一种为任何人在任何时期所接受的商品,这种困难就可以消除。同时这种商品将作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而发挥作用。这正象分数相加要先改为公分母一样。这种商品就叫货币。”^[6]

1. 货币与交换

货币,最早是被用来作为交换中介或交换媒介,即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尺度。如果是仅仅充当交换的中介、媒介、尺度,显然,要求货币用于衡量所交换的的商品的价值功能具有准确性、稳定性、一贯性,不受到因为交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上的变动而发生变化。通俗来讲,货币的购买力应该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同样数量的货币所能购买的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在既定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下,不应有太大的波动,应保持大体的一致。当然,如果同样数量的货币购买同样数量的质量的商品,会因时间、地点和方式的不同而不一样。即货币具有时间价值、空间价值,及随着支付方式或购买方式的不同,货币的价值体现也不一样。

2. 货币与生产

货币,还可以用于生产和投资,作为生产和投资的手段,要求货币自身具有生产性和投资性,并由此产生或带来预期的收益和利润。比如,因为有了货币的投入,通过购买劳动、生产资料、机器设备、技术专利、管理和创新活动,能把货币的时间价值、空间价值、生产管理者的创新能力,转化成利润,使投资者获取一个比当初的货币投入数量更多的一个货币回报。这即是货币的生产和投资功能。

显然,货币的生产或投资功能与货币作为交换功能不同。如果说,货币的交换功能具有普遍性和普适性的话,即这种功能不受持币者身份的影响,不管是谁,只要持有货币,都可用之来行使购买和交易的功能(法律上没有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者除外)。货币的投资功能,一般只掌握在具有投资能力的人的身上,即在货币的持有者或货币的使用者(但不一定就是货币所有者)能否把货币转变成投资,要受到持币者本人的学识、见地及对风险的分析判断和掌控能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说,货币的交换功能具有普遍性的话,货币的投资功能则具有特殊性(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才有了银行对贷款申请人的调查与筛选,把贷款发放给银行认为是合适的或恰当的人)。

3. 货币与调控

除了上述功能,在货币的发行者手中,货币还具有宏观调控功能,即通过对货币发行数量的掌控,以货币数量供应的伸缩性,来实施对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当经济过热时,货币当局往往会减少货币供应,以对过热的经济实施降温;当经济萧条时,货币当局又往往会增加货币供应,以刺激经济并走出萧条。

货币用于调节经济,有较长的思想渊源,白居易就说过“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7]但把货币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且上升到较为完善的理论层面的,是凯恩斯在目睹了19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后,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自兹就有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一说,通过实施相机性的、逆对经济风的货币政策,来实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4. 货币的矛盾

可见,货币在不同人的手上,所呈现的主要功能是不一样的,即在消费者手上,货币更多是用于交易商品和劳务的中介,此时,往往要求货币的币值和购买力稳定;在生产者手上,更多是用来生产或投资的工具,此时,对货币币值和购买力是否稳定就不怎么要求了,甚至在凯恩斯看来,适度的通货膨胀还会有利于生产和投资,并带来产出的增加;而在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手上,往往会用来调节经济,充当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

但是,当货币被用于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时,可能会对货币在消费者手上的交易功能和生产者手上的投资功能带来影响。比如,当经济萧条,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应时,往往会使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从而会使消费者手上持有的货币发生贬值,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进而会损害货币作为消费者用其作为交易中介的功能。同样道理,当经济过热,货币当局减少货币供应时,生产者会较平时更难筹措到货币,往往会影响到生产者进一步的生产,势必影响到了生产者的利益,实际上也会损害货币作为生产者用其作为投资的功能。

如此一来,在货币的上述三种功能中,相互之间极易产生矛盾,即消费者对货币要求的核心是货币作为价值衡器的稳定性,生产者对货币的要求的核心是货币作为投资工具从事生产投资之后的盈利性,而货币当局考虑的是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否稳定和持续,涉及到物价水平、就业情况、经济增长情况和国际收支情况,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要么会采取相应措施增加货币投放,要么通过一系列手段来回笼货币,这样,很难同时顾及到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甚至,在必要时还会,要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要么损害生产者的利益。

5. 货币的本质

人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未必是自己所要的,而自己所要的未必是自己能生产的,因为有了货币,人们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但不为自己所用的东西换成货币,再用货币去交换那些由别人生产的但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这样,货币就具有化繁为简和化简为繁的功能,即货币开通了一条从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方便之门。今天,人们往往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生产适宜于各自生产的产品(或提供劳务),尽管这些产品和劳务不一定是他自己所需要的,因为有了货币,人们就可能用这些交换到他所需要的产品或劳务。这样,货币就充当了沟通此岸到彼岸的工具或桥梁。

货币的本质,实际上由货币在消费者手上充当交易媒介的功能演变而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货币最为朴实甚至是原始的功能,即充当交易媒介,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货币被用于“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因而,货币在生产和投资方面的功能,甚至是货币作为宏观调控的功能,一旦与货币的交换功能产生矛盾时,应该有所退让,让货币的交换功能起到最基本的作用。即货币的交换功能应该是货币所有功能中具有基础性。

(二) 关于信用

信用,“信”从“人”从“言”,且“人”与“言”处于并列平行状态,居于同等重要地位。这也就有了“一言九鼎”的意思,指要求人们对于其说的话、做出的承诺要遵守,要严格坚守契约,不可出尔反尔。“对于愿意接受信用的人,必须信赖他有履行契约的能力和意志。”信用有“对物信用和对人信用”。^[6]

1. 信用的工具价值

从金融的角度上讲,信用就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当然,也有的地方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其中既包含了亲朋好友间的不要利息的友情借贷,也包含了现代商业性的以还本和付息为特征的资金运动。从会计的角度上讲,信用指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或从一般性的人情世故来说,所谓的信用,应该是指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作为金融中的信用,要求借贷关系中的各方,重诺守信。正如 Daniel Webster 所说,“信用为现代商业制度中的重要气氛,其赐福于人们,实千百倍于全世界的宝藏”。甚至,“信用是贸易生命之血(Credit is the lifeblood of trade)”。^[8]已有的不少文献谈及信用,强调人们必须重视并恪守信用时,往往是因为信用对人们有用。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转述富兰克林的话“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记住,信用

就是金钱;记住,金钱天生具有孳生繁衍性;记住,善付款者是他人钱袋的主人”。^[9]“诚实是有用的,因为它带来信用,守时、勤奋、节俭无不如此,所以都是美德……。在富兰克林看来,那些美德和所有的美德一样,只有当它们对个人具体有用时才算是美德,而且光以表面功夫来作代用品而产生同等效用时,那么这也就够了……。赚钱,赚更多钱……。营利变成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9]

信用就是金钱,或者,信用能够给人带来金钱,因为有了信用,你就可以成为别人钱袋的主人……。总之,因为信用有用而重视信用,要求大家遵守信用。信用成为人们赚钱致富的工具或手段,也就是说,信用之所以重要并且受到重视,是因为信用具有工具价值。

问题是,遵守信用的人未必总是在时时、处处、事事中得到遵守信用的好处,人们往往会在某时、某地、或某事中遵守了信用,却未必就有或者立即就有好的回报;甚至于,有的人在某个时候因为不遵守信用才得到了好处。这个时候,人们还会遵守信用吗?信用一旦成为工具,人们对信用的遵守就会时断时续,时好时坏,就会在有用的时候就需要遵守信用,在无用的时候,就可以不需要遵守信用,甚至是破坏信用。正如现在,呼吁遵守信用最为积极也最为紧迫的,往往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是因为,在一个遵守信用的环境里,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惠和好处,而从客户的角度来讲,短时间内,往往是不遵守信用甚至是抛弃信用,带来的实惠和价值最大。

所以,仅仅从工具价值的角度来要求和规范信用,是不够的,会使社会和环境对信用的实用主义式的理解和机会主义式的使用。因而,使得社会和环境所面临的信用,时好时坏,时断时续,信用的坚守和践行就会缺少连贯性和一致性。

2. 信用的精神价值

在这个时候,就要把信用上升到“精神价值”层面。即信用除了具有工具价值,还必须上升到国民的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文化自觉,一种精神追求,是国民性中不可缺少的和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信用的精神价值,孔子曾有过一个很好的阐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0]

在上面对话中,信用已经上升到了一种精神层面。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信用即位列“仁义礼智信”之中,成为指导人们行为和行动的纲常。只是在后来,特别是在近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的引进,特别是现代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信用成为对于现代经济和金融特别有用的东西,尤其是对于银行,信用的功用被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往往过多地强调信用的实用性、工具性,信用往往成为银行开展业务实现赢利的手段和措施。

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并要求信用的“工具价值”,似乎忘记了信用原本意义上就应该有的、实际上也传承沿续了几千年的“精神价值”。乃至到了今天,蕴含在信用中的“工具价值”与“精神价值”几乎断裂,或者说,在信用一词上,人们只看到其“工具价值”,也只注重并强化其“工具价值”。

问题是,如果信用的“精神价值”得不到彰显和昭示,信用在人们在思考和行动中不能成为一种思想自觉、精神自觉,信用也就难以形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自觉。只是因为信用有用,而片面地去要信用而为信用,即因为信用的“工具价值”而重视和强调信用,这样的信用自然难以继续和持久。毕竟,任何事情“有用性”,是要受到时间的空间的限制的,总是在不断消退和衰减之中的。甚至可以说,单纯强调信用的“工具价值”而忽视了信用的“精神价值”,作为“工具价值”的信用,就会因为缺少持续不断的动力来源,而难以持久。

正如朱熹诗中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要想作为“工具价值”的信用一年四季都能够“清如许”,必须有作为“精神价值”的信用的这个源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即作为“精神价值”的信用与作为“工具价值”的信用之间的关系,是林与木、源与流之间的关系。

3. 由工具价值到精神价值

如何从现有的过多注重信用的“工具价值”层次,上升到同时甚至是更加注重到信用的“精神价值”层面呢?这让人想起了德国美德的产生、发展和传承。所谓德国美德,原本只属于德国市民阶级的美德,源于其工作和劳动,与持家过日子有关,直接服务于经济生活的日常家居生活,即本来也就是“经济美德”,后来,在各级政府、教会、学校、甚至是德意志各邦国的某些君主、立法的推动和强化下,把上面这些在经济生活中有用的行为规范和意识提升到极高的地位,使这些本来只是经世致用的方法和规则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不仅仅变成市民阶级在社会中的立身之本,而且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上升为德国的主流文化。^[11]

上面引述的内容,对于当前我国关于“信用”的认识和发展,应该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即如何从已经实用化和工具化了的信用中,如何去提炼、去凝结、去升华已有的信用,结合已有的传统文化对于信用的认识,把信用上升到一种思想、精神、和文化层面,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如果这样,人们自然会时时、处处、事事都想到信用,但不会刻意地去注意到信用的有用性。这时的信用,就会成为血液或者是空气,沉浸于人的身体,或人的身体沉浸于其中,但却往往是浑然不觉。

(三) 关于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自然是实现资金融通的场所和平台。融通资金的目的,在于配置资源,实现生产和生活效用的更大化。金融机构,在传统的金融方式中,本质上还是一个“媒”,即在资金供求双方中充当一个受授信用的中介。资金的富裕方把多余的资金存入金融机构,资金的短缺方再从金融机构借入资金。金融机构在表面上是资金的集散场所,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资金供求信息的平台,进而,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利用和加工,来引导或影响资金的流向和投向,从而实现按照既定的意愿或计划来实施对资源的配置。

1. 金融机构与社会

纵观我国的金融机构的萌芽、形成与发展经历,可知最早的、当然也是较为典型的金融机构,或类似金融机构,有南北朝质库,山西票号等。

南北朝的质库,大多由当时的寺庙经营,寺庙经营质库,是因为当时寺庙集中了天下较多的财富与人力。据统计,梁朝时全国寺庙最多达 2846 所,北魏末年和北齐时全国寺庙数量高达 30 000 余所。^[12]另据唐代僧人法琳《辩正论》所记,北魏太延四年(公元 438 年)仅有僧尼数千人,到北魏末年(公元 528 年),佛寺已达 3 万处,僧尼 200 多万人。^①寺院所集中的钱财与人口,均占到当时全国钱财与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梁武帝时,“都下佛寺五百余,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13]南北朝时,寺院的典当借贷机构主要是寺库。寺库本是寺院的财产保管机构,此时已变成了使财产增殖的金融机构。《太平广记》卷 165 转引《说薮》的一则故事说“齐有甄彬者,有器业,尝以一束苧,于荆州长沙西(寺)库质钱。后赎苧,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寺)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以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还,恐古今未之有也。”《南齐书·褚渊传》还记载,褚渊薨,其弟“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纓,又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说明当时的借贷活动已经覆盖到了贫富各阶层。在北朝,僧祇粟本来是用于“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和“山林僧尼,随以给施”的,但寺院把其当成了牟利之本,“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卷,侵蠹贫下,莫知纪极”,以至“细民嗟毒,岁月滋深”。^[14]

如果说,把南北朝时的寺庙看成是中国较早的金融机构,或者说是金融机构的雏形,由于当时的寺庙将天下太多的财富和太多的劳动力集中于己,是当时的社会是难以承受的,特别是,作为金融机构的寺庙,已经干扰到了世俗社会的正常发展,其结果,必定会受到世俗社会特别是有司一方的抵制和压制。因而,这种金

^① 据《文献通考》,此时全国人口 5 000 000 户约 30 000 000 人。

融机构的发展,或者说,象这样的金融机构,注定了是难以为继和昙花一现的。难怪后来诗人发出如下感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2. 金融机构与政府

山西票号,因当时票号大多为山西人开设,且以祁县、太谷、平遥三帮为盛,故叫山西票号。票号的创始人是山西平遥人雷履泰。他原是颜料商,开设有西裕成颜料行。总号设在平遥,在北京、天津、沈阳、四川等地设分号。西裕成本来也是替人办理汇兑的,至道光三年(1823年)前后改为日升昌票号,成为专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道光初年开设的票号在鸦片战争后发展到极盛时期。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南北交通阻隔,清政府依靠票号汇兑银两,为票号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山西票号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与政府的合作。在山西票号发展最好的时候,也是与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时候。特别是山西票号在从事金融业务时,主要走的还是熟人路线和信用业务,注定了其业务的经营范围就是票号掌柜人的熟人范围,不管是谁,熟人总是有限的。而作为金融机构,是离不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而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能够掌握较大货币资金规模的调动与用度的,莫过于各地政府了,如赋税的收取和解付,官府用度的赊销与垫付等,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时间上,甚至是空间上,都需要有相应的金融机构为之打理和筹措。这样,山西票号就不可避免地把自身业务的发展依附于清朝各地政府和各级官员身上了。而清朝政府及其官员,也正好把各种票号作为自己的出纳和钱袋。“清朝官吏,上至皇亲王爷,下至道台知县,都有自己的后台票号”。^[15]

与政府紧密的关系成全了山西票号的迅速发展。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与政府关系过于紧密,也使得山西票号在后来迅速衰败下去,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在于,一是政府后来有了自己的金融机构,1905年清政府设立户部银行后,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分行,把山西票号所经营的政府这一块业务给拿走了。如光绪34年,京都祁县、太谷、平遥票帮致总号的公启,分析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后票号的不利处境说“推其原故,固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默记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到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16]二是后来清政府已经是风雨飘摇,江河日下,山西票号还是浑然不觉,依然借贷或垫付给清政府巨额资金,当清政府关门停业,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山西票号付出的巨额资金就有去无回,随着清政府的灭亡,票号的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3. 金融机构与实业

中国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发展,在二十世纪表现得最为显著,金融机构的发展在二十世纪的开端和收尾阶段,无论是从发展的速度还是从发展的规模来说,都是最为突出的。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试图通过实业图强和实业救国,江浙一带民族工业得到迅猛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几年,不少欧洲国家陷入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产品输入,给民族工业的发展,腾出了较大的市场空间。民族工业在此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迫切需要有相应的金融业为其提供融资、汇兑、结算等业务。这样,二十世纪初,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机构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盖当时适值欧战,外货来源阻塞,国内工商业有长足之进展,资金调节之需要增加,增设银行,因有必然之势。”据杨荫溥的统计,1912年设立银行14家,至1927年共设立银行185家,其中1917-1923年尤为繁荣,共设立131家。^[17]

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之后,中国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后是城市工业的改革和发展,再然后是沿海一带经济的迅猛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实业的大规模的发展,迎来了中国金融业机构的又一个发展高峰。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可以说,尽管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但现有的金融机构体系,无论是从组织结构还是功能体系上,还是相当不错的。而现有金融机构体系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发展,极大地利益于改革开放三十来年的实体经济的巨大成就。

上面所叙述的三个事例,恰好说明了金融机构在自身的发展中,应该如何协调并处理好与社会、与政府、与实业之间的关系。南北朝的寺庙中的质库的发展,得益于当时全民信佛,官府也好百姓也好,愿意把社会财富交由寺庙经营和打理,但是这种“愿意”也是有限度和有底线的,一旦寺庙的发展过于膨胀,特别是对财富和人口的控制过滥过多,势必会伤害到自身的长远的发展,甚至是正常的生存。山西票号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与政府和官员的关系密切,但过于沉浸在与政府的密切的关系中,不能审时度势,不能因时因地因势而变,不能与时俱进,最终,山西票号也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有的票号是因为被政府所抛弃,有的票号是因为被政府所拖累。而二十世纪首尾间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金融和经济之关系,尤其需要厘清和理顺。金融的发展和创新,不可离开实体经济,不可自娱自乐。实质上,金融与经济,是一种毛和皮的关系,毛长在皮上,要想毛长势好,皮必须要壮实肥沃,否则,如果皮都瘦削干瘪了,毛也就会脱落枯萎。

4. 金融机构与媒介

如果是单纯作为一个配置资金的“媒介”的金融机构,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技术条件下,可能走到了穷途末路。“媒”之本来意义,是在婚嫁男女之间牵线搭桥,且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媒不成婚”等来强化甚至是固化媒人在婚嫁中的作用,加上“男女授受不亲”等,使得男女之间缺少交往和了解,媒人几乎垄断了所有即将走上婚嫁道路的男女青年的信息,因而,“媒”在传统婚姻市场中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和完全的话语权,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进入现代社会,男女同学同事同志,相互间天天见面,彼此了解,知根知底,谁更适合自己的,大家心里有数,兴起了自由恋爱,“媒”在男女婚嫁中就不再重要了,进而是可有可无了,现在是几近于无了。

传统金融机构,作为资金供求双方的“媒”,在现代经济金融关系中的作用,也与婚嫁中的“媒”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并无二致。一是好的企业大多是股份制,且大多上市,企业所有信息,均要充分披露且公开表达,哪些企业差钱哪些企业不差钱哪些企业资金流特别宽松富裕,相互间极易了解,且容易相互拆借,不需要劳烦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二是互联网的发展,信息的发布、交流和共享已经成为常态,钱多钱少、钱进钱出的事情都可以通过网络解决,资金在时间、空间、数额、期限、价格等方面的不一致,及其他结构方面的问题都可通过网络来匹配、熨平。难怪有人说,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下,传统银行恐怕将是二十一世纪行将灭绝的恐龙。因而,如果金融机构仅仅满足于把自身当作是一个资金供求关系中的“媒”,今后的发展所遭遇到的问题就不仅仅是“脱媒”了。

5. 金融机构与发展

如果说,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现有的金融机构大多是商业性的,而合作性和互助性的金融机构则严重不足。商业性金融机构,注重的是效率优先,精力集中于业已功成名就的企业和个人,做的往往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即使是处于商业性金融中规模最小的村镇银行,其业务也往往是“抓大放小、嫌贫爱富”。^[18]而合作性金融和互助性金融,已经是芳踪难觅。即使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其所有制结构在设计之时就是按照合作制的原则来设计的,但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无论是经营方向还是业务性质,只见其信用而不见其合作,其合作性质已经是“有其形而无其实”。^[19]甚至于,有专家指出,“我国现有正规金融机构不具备合作金融组织的基本特征,我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中国 30 年农村金融改革因合作金融组织的商业化经营导致合作理想的破灭”。^[20]

其结果,作为经济的核心领域和配置资源的重要部门,金融极力发展的结果,社会经济之中,就只有锦上添花而没有雪中送炭,就会使得穷者愈穷与富者愈富,进而造成穷者恒穷和富者恒富,金融机构就会成为贫富分化的制造者和马太效应的分化器。显然,作为集中社会所有资金于一身的各种金融机构,要求其在讲效率的同时,还要适当注重公平。也就是说,既要有商业性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大潮中以利润为导向在前面冲

锋陷阵,也要有合作性互助性金融机构在后面护卫兜底,给相对弱势的人口和落后些的地区提供一些必要的金融服务,助其在自身的努力下通过金融的适当帮助摆脱贫困走上发展富裕之路。这样,整个经济的发展才是相对均衡的,全社会在发展进步的过程之中才会实现阻力较小而效率较高。

三、关于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

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和源泉,金融产生于经济并服务于经济。但是,时间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了些变化。

尽管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如今的金融发展,看似不仅是在引领着经济,还有甩开经济,独自往前一路狂奔的势头。比如说,实体经济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由这一单位的产品往往会产出五、六个单位的贸易,再在此基础上会产生十多个或几十个单位的金融交易。因而,当前的经济产出与金融资产之间,并非是相互对应的关系,甚至是相互间变得越来越没有关系。已有的经济产出,往往被金融过度稀释,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商品化、货币化、资本化、证券化,实质上就是金融化,或简化为钱化。

同时,财富的创造不再仅仅依赖于农业和工业,往往是更多地依赖于对金融资产的腾挪翻炒,有些甚至本不是金融资产,因为有了炒作的空间也被人为地贴上了金融资产的标签。30年前是造原子弹的赚不赢卖茶叶弹的,如今可能是,不管你是造原子弹的还是卖茶叶弹的都赚不赢玩金融资产的。特别是越来越多的资产被贴上了金融资产的标签,比如住房,就已经成为了一项重要的金融资产,一度时间,做工业也好,做农业也好,都不如做房地产的,而做房地产的,往往又不如炒房地产的。如果说,因为确实需要占用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房地产成为金融资产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那么,绿豆(逗你玩)、大蒜(算你狠)、生姜(将你军)、辣椒(辣翻天)、苹果(凭什么)等小棕农副产品也纷纷成为金融产品,成为人们投资投机炒作并赚取差价的对象,表面上是通过对物的低买高卖来获取利润,并从中完成财富积累,实质上是在玩以钱赚钱的游戏,正好适合了两千多年前的先贤亚里斯多德所说,“它不是对金钱的自然使用,而是从金钱本身获取利益,在一切生财方式中是最不合乎自然的”。

不说一国当年金融交易的规模,要远远大于该国当年创造的GDP,就说一国金融偶有个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之类的小病小恙,往往会把该国经济整得颠三倒四、死去活来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无不把世界经济搞得要死要活,死去活来。有意思的是,传统上往往是因为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导致银行坏账之后才发生金融危机的,即实体经济不行了金融才跟着不行的。如今,往往是因为金融出问题了,倒过来影响实体经济并使得实体经济出问题。

也许,表面上是人在玩钱,实际上,可能是钱把人给玩了。

参考文献:

- [1]色诺芬.论经济·雅典的收入[M].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5,20,18,26-27.
- [2]苗力田.亚理斯多德选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7.
- [3]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
- [4]苗力田.亚理斯多德选集: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3.
-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0.
- [6]威廉·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27.
- [7]白居易集:卷六三[M].中华书局校点本.
- [8]转引自周大中.现代金融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6.
- [9]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5,29.
- [10]杨伯峻译注.论语·颜渊[M].上海:中华书局,2006.

- [11]李伯杰. 美德是怎样炼成的[J]. 读书 2013(12):37-39.
- [12]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下)[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843-846.
- [13]南史卷70·郭祖深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书店, 1986:189.
- [14]魏书·释老志. 本节南北朝资料转引自任怀国, 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J].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 2000(3):5-10.
- [15]山西票号史料[M]. 山西: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143.
- [16]李宏龄. 山西票商成败记[M]. 转引自叶世昌, 潘连贵. 中国古近代金融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17]叶世昌, 潘连贵. 中国古近代金融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236.
- [18]聂伟柱. 村镇银行异化之路: 变相跨区棋子[N]. 第一财经日报 2012-11-02.
- [19]谢平, 徐忠, 沈明高. 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评价[J]. 金融研究 2006(1).
- [20]陆磊, 丁俊峰. 中国农村合作金融转型的理论分析[J]. 金融研究 2006(6).

The Thinking about Economic Financial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LI Sihong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s from ancient time to now, from China to abroad, it finds that the word economy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pay attention to virtue, to be kind to others, and “don’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don’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The difference is that western economic begins with home management, that is, starting from micro, then develop to macro in recent times, the path is from “regulating the family” to “governing the country”; China’s economy begins with country management, namely, starting from the macro to the micro in recent times, then to people-oriented, the path is from “governing the country” to “regulating the family.” Finance as the most active part in the economy, its composition of currency, credi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plays different roles, shows different value and has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Finall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view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Key words: economic; monetary; credi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责任编辑: 沈 五)